

# 鄭板橋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国画家丛书

# 郑板桥

潘茂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郑板桥**

潘 茂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责任编辑 胡海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 附图 12 页 字数 32,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500

统一书号: 8081·12052 定价: 0.47 元



郑板桥像

## 目 次

|           |    |
|-----------|----|
| 一 引言      | 1  |
| 二 生平概述    | 6  |
| (一)童年时代   | 6  |
| (二)青少年时代  | 7  |
| (三)在穷途上挣扎 | 8  |
| (四)出任山东   | 9  |
| (五)卖画扬州   | 14 |
| 三 文学成就    | 19 |
| 四 艺术成就    | 26 |
| (一)绘画     | 26 |
| (二)书法     | 40 |
| (三)题跋     | 45 |
| (四)印章     | 50 |
| 五 小结      | 53 |

17 丛兰荆棘图卷(之五)

18 丛兰荆棘图卷(之六)

19 丛兰荆棘图卷(之七)

20 丛兰荆棘图卷(之八)

21 巨石兰竹图

22 碧影新篁图

23 柱石图

24 书 法

25 露竹新晴图

## 一、引言

二百年前，在古老的扬州，涌现了一支新兴的艺术力量。它象一簇晨星，闪烁在当时的画坛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的名称，最初见自清李玉棻所著《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和张寅所著《清朝画征三录》。他们是指金农、黄慎、李鱣、郑燮、李方膺、汪士慎、高翔和罗聘。从年龄最大的李鱣出生（公元1684年），到年龄最小的罗聘去世（公元1799年），共一百十五年。这一百多年，正处于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王朝的所谓“全盛”时期。从表面上看，这个时期的国家政权已经获得巩固，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由于封建统治者采用了某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农业、手工业日渐得到恢复。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因为帝王们的提倡，罗致各地书画家、雕刻工、装裱工等，在北京启祥宫南面开设了皇家艺术院——如意馆。呈现出一片兴盛的景象。但从实质上看，清朝统治者用尽了高压政策和怀柔政策。他们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其目的是为缓和国内各种矛盾，更加巩固其封建王权，不过是出现一时的虚假繁荣。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隋唐时期，扬州就以繁华著称，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扬州繁盛非凡，简直成了“人间天堂”。如李白有“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杜牧之的诗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徐凝《忆扬州》中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把扬州说得是很突出的。张祜在一首《纵游扬州》的

七绝中,说得更是别出心裁:“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人认为不仅活着要在扬州,即使死了葬在扬州也是最理想的。还有人曾想“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所有这些,足以看出隋唐时期扬州豪华的一斑。到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代,扬州又再度繁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国内市场和经济中心之一。因为扬州是长江和大运河交汇之处,地扼要冲,商业发达,既有大运河航运之便,又是全国最大的盐业集散地,海盐吞吐量居全国第一。因此,管理盐务的最高行政机构“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门,就设在这里。更由于康熙、乾隆多次“南巡”,每次都到扬州,在扬州设有几处行宫,这里曾大事修葺装饰,增加和美化了不少名胜遗迹。盐商发财致富后又在这里建筑了不少庭园池馆。加上这里手工业十分发达,精于核刻、玉刻、瓷刻、木刻、竹刻、漆刻、砖刻、象牙雕刻,盛产玉器、红木雕刻、漆器镶嵌等工艺品。扬州的繁华,可谓极一时之盛。“海内文士,丰集维扬”(见谢堃《书画所见录》)。生活在这里的盐商,是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商人。他们与官吏勾结,营私舞弊,牟取暴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或者以钱物贿赂官吏,买官求爵。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乾隆几次下江南,经过这里,扬州盐商们送礼,动辄千百两白银。雍正四年,为了建造所谓“盐义仓”,两淮盐商捐银二十四万两。乾隆二十六年,两淮盐商又大献殷勤,捐银一百万两为皇帝建造行宫,占当时全国年盐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这些数字是非常惊人的。皇帝得了好处,就“恩赐”盐商,公开下令使食盐提高售价,增加损耗,给予贷款,生息取利,甚至封官赐爵,提衔加级。这样一来,凡是较大的盐商,大都有官衔在身,成了有钱有势的盐官。于是通过官督商销、官运商销、官督民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等手法,大肆剥削广大劳动



人民。一味追求享乐腐化，过着奢侈糜烂的寄生生活。“争奇斗异，不可胜记”（见李斗《扬州画舫录》），结果是有异皆备，无奇不有。

随着新兴的商业经济的萌发，市民追求个性解放，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官商阶层及其帮闲们也免不了附庸风雅，欣赏书画艺术。

从当时的中国画坛来看，山水画、花鸟画基本上是清初“四王吴恽”的天下。奉为“正统”或“正宗”。特别是在供奉内廷的书画谱总裁、户部侍郎王原祁的影响和倡导之下，画坛上出现了一股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逆流，摹拟之风大盛。不少画家心目中，只知有古，而不知有今，以摹古、仿古为能事。在整个画坛上，虽然也有一些从现实生活出发，重视写生，开辟道路的画家，但为数极少。这种呆滞的局面，在当时江苏地区画坛上也十分明显。号称“清初六大家”的画家中，有五个是苏州地区的太仓、常熟人。我们不能一笔抹煞他们在笔墨技巧方面的功夫，但他们大都是复古守旧的；另一位大画家恽南田是常州人，他重视花卉写生，一洗时习，别开生面，可是末流所趋，也是以临摹为主，以形似为目标，仍然走到了老路上。到乾隆年间，有的画派如“松江派”、“金陵派”将成过去；有的如“虞山派”和“娄东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慢慢地衰落，日益趋向平庸和呆板，走着下坡路。这样，在古老而又新兴的扬州，终于发生了画界新的变革，“扬州八怪”就此出世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想到：政治上的黑暗残暴，不能不引起人们，特别是正直的知识分子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深切追求（这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一系列文学名著中可以看出）；画坛上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阴云在到处弥

漫,不能不在某些薄弱环节孕育和爆发新的画界革命;扬州新兴的商业经济和反映这种商业经济的市民意识的日益兴起和发展,不能不提出一种新奇活泼的精神生活的要求。所有这些,就是产生“扬州八怪”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

我们从画家的出身、爱好、性格特征等方面来作些考察和分析,就不难看出:“八怪”都是些坚守节操,不流时俗,不愿做官,或虽入仕途,但不善逢迎,遭谗罢官的人物。他们有的是扬州人,如高翔原籍甘泉,李鱣、郑燮原籍兴化,均由扬州管辖,李方膺是南通人;其余的原籍浙江、安徽、福建,都是寄居扬州的。尽管他们穷困潦倒,生活艰难,但穷得有骨气,不肯屈从权贵,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却又能眼睛向下,关心民瘼。他们在艺术上,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创造革新。创作题材以花卉、翎毛,特别是梅、兰、竹、菊为主,间或兼工山水,刻划一些社会下层人物。这样,画的题材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丰富了许多现实生活的内容。这些作品,寓意深远,富有民间生活气息。在艺术实践中,他们善于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既能向大自然学习,又善于学习古人和当时画家的长处,特别是在继承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花鸟画,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使开创于宋元,经过明清徐渭、陈淳、朱耷、石涛等不断丰富发展的水墨写意画,得到了新的发展和提高。值得重视的是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学基础,把诗、书、画、印这四种本来独立分开、但有密切联系的姐妹艺术,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并且把这种特有的民族形式,推向新的高度。他们用笔洒脱,大胆泼辣,构图新颖别致,充满着豪放的精神和隽永的情调,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影响所及,近百年来如虚谷、赵之谦、任颐、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王梦白以及李苦禅等等,无不受到“八怪”的影

响。然而“八怪”在当时，却被指为“旁门外道”、“邪魔怪道”，而大加歧视、排斥，认为他们人“怪”，画“怪”，是一群与众不同的“怪物”。他们的作品，根本没有资格登大雅之堂。而“扬州八怪”的声名，一直被淹没在流言蜚语当中。今天我们有责任来对“八怪”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绘画史上给他们以应得的地位，并且有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他们留下来的这份极其珍贵的遗产。

## 二、生平概述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排行第一，自称郑大、郑大郎，号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晚年署作板桥老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十月廿五日，卒于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十二月十二日，终年七十三岁。他一生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四十四岁以前，是在贫困中成长的阶段；四十四岁以后，六十一岁以前，是中举做官的阶段；六十一岁以后，是卖画终老的阶段。从他的行迹和作品来看，他不愧是清代一位进步的、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 （一）童年时代

板桥的家庭是个“书香”门第，世居苏州，明朝洪武年间才迁到兴化县城东的汪头定居下来。曾祖名新万，字长卿，是个庠生。祖父名湜，字清之，是个儒官。父亲名之本，字立庵，号梦阳，是个品学兼优的廪生，先后教授过几百名生徒。舅父汪翊文，奇才博学，隐居不任。生母汪夫人，在板桥出生三周岁时就去世了。板桥有“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歿还相呼”的凄侧诗句。以后，他父亲又娶了个继室郝氏，对板桥也很疼爱。板桥在《七歌》中追念道：“无端涕泗横阑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板桥有个叔父名之标，字省庵，也很爱板桥。他叔父只生一个儿子名叫郑墨，字五桥，也是个庠生。板桥没有同胞兄弟，只有这个堂兄弟，他

们的感情很好。从《七歌》中可以看出，他原来家业有三百亩典产，还雇用过佃户、女佣等人，新置田地一季谷子能收获五百斛（约合二百五十石），是个中小地主家庭。只是当板桥出世时，家业渐次衰落，已沦为“破落”地主，一家数口只能过着比较清苦的生活了。由于板桥自幼丧母，即由他祖母蔡夫人的侍女、同村人费氏抚养长大。费氏待板桥如亲生儿子，不论费家吃鱼虾还是瓜果，总是先给板桥吃，然后再分给她家里人吃。在灾荒年景，也总是驮着板桥上街，先买块饼塞在板桥手里，再去料理家务。就这样，一直服侍到板桥中了进士以后，她七十六岁终老为止。费氏有段时间暂时离开郑家，临走前，把板桥老祖母的旧衣服洗好补好，把缸里的水汲满，买几十捆柴草堆积在灶下，就走了。板桥早晨跨进费氏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摸摸灶上尚有余温，锅里藏着一碗饭，一盆菜，就是费氏平时给板桥准备的。板桥一见这种情景，只是痛哭，连饭也不想吃了（见《乳母诗》序）。费氏勤劳的一生，给板桥的感染是很不寻常的。当他考中进士后，还经常想念她生前的情景，写过一首有名的《乳母诗》，其中有“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之句，看出板桥对她的情感是真挚而深切的。这说明了在板桥幼小的心灵上早就受到劳动人民思想的熏陶，对板桥的健康成长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 （二）青少年时代

青少年时代的板桥，一直受着他父亲的直接教育和舅家的影响，长大后才离开家庭到真州（即现在的仪征）毛家桥求学，二十岁左右从乡前辈陆种园及楼兰亭先生学填词。板桥读书很发愤，很刻苦，善于独立思考，循序渐进，而且能在“熟读”上用苦功夫，经常一部书要读上千百遍，务求能背得下来。因此他就利用

船上、马上，甚至躺在床上的一切时间进行学习。有时忘了吃饭，有时客人来了讲些什么话也没听到，甚至连自己说了些什么，一会儿也忘了，说明他非常集中思想在默诵。板桥不喜欢繁琐考证的经学，而爱读历史、诗词、文学等作品。不是老坐书斋死读书，他喜欢走出家门，面向大自然，留览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墓墟等地方，读文论艺或纵谈天下事，口气很大，无所顾忌，大家都认为他很“狂”。由于板桥废寝忘食，专心致志，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在二十多岁时就成为地方上很有声名的秀才了。

### （三）在穷途上挣扎

大约三十岁上，板桥的父亲去世。后来他的妻子徐氏与叔父又相继病逝。从此，一家数口全靠板桥来维持。本来家境就比较清贫，加上丧父亡妻，拖男带女，年景不好，生活就显得更加窘迫。从《七歌》中可以看出，断餐断顿，忍饥挨饿，用睡觉来代替吃饭，代替穿衣，这便是板桥一家人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板桥既不能继续攻读，又不能外出谋事，连孩子读书的“束修”也出不起，只得辍学回家。不久，独子又早逝，该是多么悲痛，从《哭悼儿五首》中可以知道那时他家天天喝稀粥，祭儿只得用汤匙盛饭。生活这样困难，先是卖祖上的遗书，当衣典物，再就是东借西贷。有一年端午节前夕，板桥在兴化东门宝塔湾当塾师的时候，为了债务，只得逃到焦山有同乡和尚的庙里躲避。凑巧遇上了正在行吟的诗人、候补知州马曰琯。他们两人原来不相识，只因板桥在听到马曰琯吟了“山光扑面经宵雨”的诗句后，一时不能续句，就上前拜见曰琯，说你的诗很好，给我听到了。马说：“诗思涩甚，先生能举其偶乎？”板桥说：“不才已得‘江水回头欲晚潮’七字，不审足下谓何？”曰琯一听大加赞赏，说这句诗比他

那句自然、有味。问了板桥的住址，第二天走访板桥，请他到自己住的松寥阁去弈棋，并且设榻请板桥搬到那儿去住。玩了几天，板桥面露愁容，曰琯发现后就问说：“君系雅人，方始作乐，为何郁郁不欢。”板桥就把躲债的心事如实告诉了曰琯。没过几天，曰琯暗中派人送二百两银子到郑家，给他解了围（见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十九义侠类上）。在“傍人门户度春秋”的教馆里，板桥这个穷秀才出身的塾师，等于是“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他很想摆脱这种困境，去追求功名利禄，可是未能如愿以偿。他几次赶考，都没有考中，于是心灰意懒，彷徨消极，悲观失望，变得行迹散漫起来：“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这时，板桥在“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的扬州，开始过着饮酒近妓，放荡不羁的流浪生活。终于因为“清狂不检”，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责备。日子一年年的过去，家境贫困的状况终难改变，幸亏遇到江西程羽宸，慷慨解囊，以一千两银子相救助，才“扫开寒雾”“一洗穷愁”，使他解脱家庭的牵累，得以出游庐山、燕京、杭州等地。板桥对于这位遇难施救的程羽宸念念不能忘怀，诗中曾有“几夜辛酸屡梦公”之句。

#### （四）出任山东

板桥在得到朋友对他的资助后，再度离开家乡，到焦山别峰庵、双峰阁发愤攻读，在雍正十年他四十岁时考上举人，乾隆元年他四十四岁时又考中进士。那时是“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一中进士，就获得了踏上仕途的机会。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他四十九岁时被派往山东范县任县令，过五年，调山东潍县作了七年知县，先后在山东做了十二年的县官。

范县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地处黄河北岸。板桥去范县上任

的第一天，就叫人把县府衙门的墙壁打了百来个洞。大家莫名其妙，他解释说是“出前官恶习俗气耳”。（见曾衍东《小豆棚杂记》）

这里的百姓打官司的人很少，衙门里清静得很。板桥一有空暇就饮酒看花，醉后还要拍着桌子高唱。声音传到门外，一些皂隶听了就窃窃私语，说这个县官真有些癫疯。这个议论给小丫头听到，急忙奔告板桥的家属。家属劝说：历来只有狂士狂生，没有听说还有狂官，应当引起注意。之后板桥就改在黄昏之后喝酒，酒后就睡觉，不再象开始时那样（见家书《范县署中寄郝表弟》）。

照例当时一个县太爷出门总得鸣锣喝道，可是板桥经常穿了便服外出，接近群众，了解民情，刻刻以人民群众的痛痒为念。他经常不在衙门里，而是在乡下巡视。《范县呈姚太守》诗中曾说：“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他办事公道，有比较明显的爱憎观点，能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

一次，有个姓李的四川籍书生，县试考中第一名。但是考生们因他不是本地人，大家哄起来，不准李生应考。李生找板桥大哭了一场，诉说他已迁居范县十七年了，如果要回原籍应试，一则路途遥远，蜀道难行，二则即使回原籍后语言不通，实在无法可想。板桥听了十分同情他，立即向府宪报告，请求解决。府宪反而诬说板桥“私有所徇，乖违公义”。板桥如哑子吃黄连，有苦没处说，只得忍痛除名。但为了李生的前途着想，就把他收做画徒，热心教育栽培他（见《与同学蔡希孟》）。

崇仁寺和大悲庵邻近相对，有对年轻的和尚尼姑相爱，村上人因为他们触犯了“清规戒律”，抓去见官。板桥看看他们两人



年龄相仿，情投意合，就“令其还俗，配为夫妇”，并且写了一首律诗送给他们。其中有两句：“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这表明板桥那时已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了。

《小豆棚杂记》还记载着一个故事：板桥有次因公到省城济南去，上司都很器重他，请他上趵突泉赴宴，一边喝酒，一边观赏那“天下第一泉”，并嘱咐他做诗，板桥应声道：“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难人辨识清泉。”大家听了很不高兴，说是在讥讽上司。其实这首诗很有胆识，一下刺痛了那些贪官污吏。

乾隆十一年丙寅（公元1746年），板桥五十四岁时被调到潍县当县令，潍县在渤海边，盛产海盐，盐商很多。盐商有官盐和私贩两种。官盐要有钱有势的大盐商才能经营，往往倚势欺压小本经营的私盐商。板桥在任期间，对于公私盐商的诉讼事件中，也能公平判断保障私盐小贩的利益（详见《小豆棚杂记》）。

兴化竹横港五房族弟与周家发生了土地纠纷。原来板桥的族弟有五亩良田是当绝契卖给周家的，而族弟硬说是活契，要郑墨替他说情，把田赎回。郑墨不肯，他就诬告郑墨庇护周家。板桥在家书中得知此事后，认为族弟无理取闹，写信给郑墨表示说：“即使至余案下控诉，断事只评公理，亦祇可归周氏管业。”（见《郑板桥家书》）

潍县地方每到冬天，偷盗抢劫的事很多，弄得人心惶惶，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情绪和正常生活。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板桥就招集当地人编成小队，专事巡查、防范和缉捕罪犯。这本来是好意，不料队里有些不纯分子滥用职权，遇到小孩玩牌也擅入人家，以抓赌为名，进行敲诈勒索；碰到夜行农民，则诬指为“贼”，强行吊打，一定要竹杠敲到手才肯罢休。而对于坐地分赃